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

丁俊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封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宋庆龄以其崇高威望和巨大感召力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承担起对外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这一特殊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3、40年代,日本法西斯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彻底战胜这一凶残敌人,毫无疑问“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①。然而,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援助,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进行关于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工作,无疑是争取外援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封锁,更好地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宋庆龄以其崇高威望和巨大感召力,邀请了一批中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是一个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真实地宣传中国抗战,“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②,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③,从而使保盟“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关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④。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和“保盟”始终把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义不容辞的“职责”^⑤。必须指出的是,早在“保盟”成立之前,宋庆龄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国外介绍有关中国抗战的情况。例如: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章,给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罪行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写信并发表《告英国民众书》,对美国民众发表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演说,致电有21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参加的世界反侵略运动大会,就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发出《向全世界妇女申诉》,等等。这在客观上奠定了“保盟”成立后开展国际宣传工作的良好基础。

“保盟”成立后,国际宣传工作极为出色。仅在1939年4月前,就先后印发了7种宣传品,其中包括5种油印的《时事通讯》。1939年4月1日,“保盟”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半月刊),简称

《新闻通讯》，发给外国的有关机构和“保盟”支部。《新闻通讯》主要刊登由“保盟”驻各地通讯员、联络员、战地记者、以及来自抗日前线的各界人士提供的消息和报告，内容丰富，报道及时，图文并茂，是那个时期“唯一的站在人民立场上刊载事实真相的英语印刷品”^⑥，每期发行约2500份，深受世界各地友好人士和爱国侨胞的欢迎。为了扩大和加强宣传效果，“保盟”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和各種小册子，并印刷套色招贴画发往世界各地。为了满足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需要，宋庆龄和“保盟”又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日报《华商报》。

除了办报、发行刊物之外，宋庆龄和“保盟”还利用广播演讲、集会动员、撰文写信、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宣传工作。譬如：1938年8月，有52个国家参加的世界青年大会在纽约召开。宋庆龄专程赶到广州播音台，用英语向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同年9月，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宋庆龄亲自出席并作题为《华侨总动员》的大会发言。1939年3月8日，香港各界妇女集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到会并发表了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国大地初步展开后，宋庆龄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一由她亲自促成的生产自救运动，并于1939年底在香港ZBW台发表了《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说。1939年至1941年底，宋庆龄还先后发表了《救济战灾儿童》、《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告美国友人》、《我们的第一年》、《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中国、世界和你》、《救济工作和政治》、《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等文章，来宣传中国抗战，呼吁国际社会予以积极的援助。宋庆龄和“保盟”还多次主持上演进步电影和戏剧，并利用从抗战前线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图片、战利品及各种实物举办展览会，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宋庆龄和“保盟”中央被迫迁至重庆，所办刊物《新闻通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被迫停刊。从此，“保盟”的国际宣传工作便主要由宋庆龄以向国外写信、在国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声明等形式进行。这一期间，宋庆龄先后撰写并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从香港到重庆》、《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致美国工人们》、《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等等。同时，宋庆龄和“保盟”也设法将一些文字资料在国内编辑后，寄到国外出版。如1943年由宋庆龄主持制定的“一篇关于救济情况的详细报告书以及‘保盟’的计划，通过纽约一个支持我们的机构得以印刷而分发到全世界”^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盟”在国内难以出版发行英文刊物之不足。

宋庆龄和“保盟”所进行的国际宣传作品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贯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介绍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和团结抗战的实情，表达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亲日派散布所谓“战必大败”的亡国论调和失败主义。宋庆龄对此进行了公开批驳，指出：所谓“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过高估计日本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中国抗战的力量”^⑧。她引用大量确凿的材料深刻论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所存在的弱点，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又决不能希望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相反，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⑨，特别是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他们准备着为卫国保家淌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打起游击战争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⑩，中国人民以勇士的决定和血肉之躯，抵抗侵略者的巨舰、大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全体民众的义愤，尽足以补偿军械上的差逊而有余”^⑪。两相对比，宋庆龄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即使中国不得不单独与日本作战，也不会打败的”^⑫，中国一定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夺取抗

战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⑤。宋庆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精辟论断和光辉预见，可谓振聋发聩，使人信心倍增，这对于正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宋庆龄无比激动地欢呼这一历史性成就，以满怀喜悦之情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内战已经终止，内部磨擦已经消除，“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⑥；“中华民族现在已经象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各党各派捐弃前嫌，团结在抵抗并击败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标的周围，“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如此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⑦，它正发生伟大的力量，“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的痛击”^⑧；经过抗战的洗礼，我国人民将彻底摆脱奴隶地位，“我们将不仅在战场上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⑨。宋庆龄善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宣传，对于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改变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东亚病夫”形象，弘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坚定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二、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强调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世界各国人民予以积极的援助。

宋庆龄和“保盟”向全世界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指出：日本侵略者以现代化的杀人武器，用恐怖野蛮的方法，任意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包括妇女和儿童；轰炸毁灭城镇和村庄，迫使千百万群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使“全世界笼罩在疯狂的侵略者的毒焰里面，文明处在毁灭的过程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大众在战栗中生活”^⑩。宋庆龄和“保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也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与自由。“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⑪。

宋庆龄和“保盟”反复向各国人民强调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伟大斗争的战场之一”^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⑬，也是为了“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⑭；强调“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并且“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⑮。亿万中国人民不愿做奴隶而奋起抗战的英雄壮举，“改变了太平洋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历史，并且使它更加光辉了”^⑯。因此，正在为自己同时也为全人类而战斗的中国人民有权利要求外援，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援助中国”，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⑰。毫无疑问，“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以制止日本侵略，对于各国……是有利的”^⑱。

宋庆龄和“保盟”多次阐明“救济应当和对法西斯的斗争结合在一起”^⑲这一全新的救济观念，指出“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民主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的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⑳。中国人民欢迎一切真心同情中国抗战的援助，但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团体“把在中国土地上分发援助物资当作‘恩施’或用来做为政治影响的武器”^㉑。

宋庆龄和“保盟”关于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和国际意义的宣传，以及所阐述的关于救济的全新观念，打破了“恩赐”、“施舍”、“行善”等传统的陈旧的救济观念，“为中国人民和给予物质援助的外国团体与个人之间，灌输了新的精神”，“它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真正面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先锋，并且力图使所有的捐款人，成为这个斗争的自觉支持者”^㉒，这

就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纳入他们应尽的国际义务范畴,从而赋予这种援助以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使正在进行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和援助中国抗战的世界各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对于有效地争取外援以增强中国抗战力量无疑是有益的。

宋庆龄和“保盟”还严厉驳斥了所谓中国人有“依赖外国的倾向”的论调,指出:“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地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相反,“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⑤。这一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辱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也赢得了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的敬重、理解和支持。

三、谴责英美等国在所谓“中立”和“不干涉”幌子下采取的两面政策,揭露国内某些人的妥协投降倾向及分裂倒退行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英美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两面政策: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损害了它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同日本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但是它们当时正忙于应付由德意引起的西方紧张局势,又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因此,它们一方面主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寻求妥协,并通过贸易渠道给日本提供大批战争物资,企图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来缓和它们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宋庆龄和“保盟”强烈谴责英美等国在所谓“中立”和“不干涉”幌子下所奉行的两面政策,指出英美等国向日本提供大量造成死亡和毁灭的军火材料,使日本军阀坐着美国制造的军用卡车和铁甲车横行中国,用美国提供零件的飞机和美国钢铁制成的炸弹轰炸中国,用美国的机件来维持日本战时工业机构,“准备着更多的死亡带给我们”。可见,英美等国进行这种血腥的罪恶贸易在“道德上的责任是极重而无法逃避的”,所谓“中立”不过是“把这些事实从国民的良心中掩蔽起来”的“一种招牌”^⑥。宋庆龄和“保盟”强调,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要保持真正中立,“实际上不可能”。英、美、法、苏等国家应采取联合行动,“以帮助中国来帮助一切自由民族的利益,”粉碎“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的企图^⑦。宋庆龄和“保盟”呼吁世界各国青年特别是英美两国青年行动起来,敦促本国政府“站在人类正义的这边行动”,对日本实行联合封锁,给中国抗战以“道义的同情和物资的援助”^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重大变化和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趋严重。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与日本的暗中接触从未中断,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从1939年起,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致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反共流血事件接连发生。

鉴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和“保盟”在国际宣传中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国内存在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分裂倒退行为作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指出“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出入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现实”^⑨。她提醒人们,要警惕日汪之流勾结,以名为和平谈判、实为妥协投降的手段来削弱中国抗战,以压制民主、破坏群众运动和蓄意制造内乱来达到“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之目的^⑩。宋庆龄和“保盟”呼吁:“实行抗战的全盘政治动员”,“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降的阴谋”,制止国内的投降倾向^⑪,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全民族团结,

“放弃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国内争端”^⑧。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和“保盟”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件怪诞而野蛮的事件”^⑨痛心疾首，不仅通电谴责蒋介石的分裂行为，要求其“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⑩，而且通过新闻媒介将皖南事变昭示海外。1941年2月15日出版的第26期《新闻通讯》专门发表长篇述评，向全世界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上第一次知道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⑪。

为了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1941年10月，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文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概念，论证了争取民主、加强团结与维护国共合作、巩固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抗战的关键在于内部团结”，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而战时中国“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最大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绝好的机会”。宋庆龄呼吁：“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缺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⑫，并从舆论上迫使顽固派取消对解放区的封锁，“同等看待所有的抗日力量”^⑬。

宋庆龄和“保盟”对英美两面政策的谴责，以及对国内妥协投降倾向和分裂倒退行为的揭露，对于有效地动员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持中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四、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业绩，反映他们在医药、资金、物资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呼吁各国人民重点援助中国的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华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宋庆龄和“保盟”作了大量真实报道。他们高度评价平型关战斗，指出八路军“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⑭。他们及时报道百团大战情况，指出“这一振奋人心的行动，使日本军队在其他地区得到的进展相形见绌”^⑮。他们赞扬活跃在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新四军，“作战灵活机动”，战果“引人注目”^⑯。他们热情称颂敌后抗日军民“坚持要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并正在敌人后方为新的民主的中国建立根据地”的英雄气概^⑰，指出敌后军民在缺衣少粮甚至连最起码的医药和物资供应都没有的困难条件下，“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化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⑱，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本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兵力，“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⑲。他们强调，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根据地是“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⑳，是中国抗战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因素。

宋庆龄和“保盟”指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牵制着日本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兵力，但国内政治的封锁却使他们得不到资金、物资和医药的援助，“甚至由外国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㉑。因此，“保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他们。这并不是“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㉒。“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灾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㉓。这就明白无误地阐明“保盟”把援助重点放在解放区，是“保证维持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的团结”、“争取最后的胜利”的需要^㉔。

宋庆龄和“保盟”还以极大热情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面貌，特别是华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西北和皖南的工业合作运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保育院的发展情况，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影响。

宋庆龄和“保盟”卓有成效的国际宣传工作，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使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一定了解，同时也在中国人民和各国援华团体、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使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从而成为“保盟”的积极赞助者和中国抗战的志愿捐赠者。

在具体分配和使用外援的过程中，宋庆龄和“保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立场，遵循按照平等和比例进行合理分配的工作原则，贯彻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救济方针，将所争取到的医药、物品、资金等各类外援主要用于医疗救护、生产建设、灾童难民救济等方面，而将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局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和“保盟”想尽一切办法，越过重重障碍，凭借飞机、火车、汽车、轮船、木筏、人力、畜力等各种运输手段，将外援安全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到坚持敌后抗战的解放区军民手中。这不仅为严重缺医少药、物质和资金极度缺乏的敌后抗日军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物质援助，而且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因而绝对“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⑥。

综上所述，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沟通中国抗战和国际援助的桥梁作用，圆满完成了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各国人民、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这一特殊使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 释：

- ①⑤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452、115—117、120、118、117—120、123、127、142、140、125、175—176、130、130、452、147—151、172、141、172页。
- ②③④⑥⑦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5、4、55、69、55、16、8、55、17、53、51、28、35、28、7—8、44、45、45、46、46、49页。
- ⑩⑬⑭⑯⑱ 《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宋庆龄向美国人士广播演说》，上海《大公报》，1937年10月21日。
- ⑰ 宋庆龄：《中国不亡论》，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2—21页。
- ⑲ 宋庆龄：《告英国民众书》，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3月2日。
- ㉑㉒㉓ 《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 ⑳ 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 ㉕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第20期，1940年9月15日。
- ㉖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第25期，1941年1月15日。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